



学习鲁迅先生

许钦文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学习鲁迅先生

許欽文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学习鲁迅先生

著作者 許 欽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4 1/2 字数：84,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237

定价：0.48元

12/139/08

前 記

这些篇散文，主要是紀念偉大的五四运动和魯迅先生，学习“五四”和魯迅先生的斗争精神的。要紀念，应该学习，通过紀念来进行学习，把五四运动的情况和魯迅先生的言行温习一下，研究一下，可以得到各种启发，有所感悟，借以策励自己，这是我所以要这样紀念的目的。至于写成文字，无非因为各方面的囑稿。現在編成集子，固然由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約稿，实在是要向偉大的国庆十周年献礼。自然这只是一些微薄的礼物，不过我在写作的时候，主观愿望，是在党和毛主席文艺方針的指导下，想要通过所紀念事物的評述，对于青年讀者在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領会上有所帮助的。

为着献礼，所以把反映一年多来大跃进情况的一些篇也編在这里。

因为是一篇篇随时写下的，經過相当长的時間，不免有些重出的詞句。已經删掉一些，因为各篇独立，为免不能自圓其說，不便尽行删去。

篇幅短，篇数多，各篇形式不一，有点复杂，或者可以說是“百花齐放”。至于水平不高，我自己知道；或且有錯誤之处，这只好請求讀者指正了！

許欽文 一九五九年夏于西湖

目 次

前記	111
送妹子上北京	1
五四运动中的浙江潮	4
“五四”时期的学生生活	7
忆沙滩	10
忆春光社	13
忆“五四”話爱罗先珂	15
震动宇宙的創举	19
欢迎祖国英雄儿女凱旋	21
魯迅先生在磚塔胡同	23
在老虎尾巴	29
我和魯迅先生鉄門話別的一幕	34
在老虎尾巴的魯迅先生	37
从“东壁下”看魯迅先生的生活方式	45
魯迅先生刻下的一个“早”字	48
在給魯迅先生責罵的时候	50
在对魯迅先生的哀悼中	54
跟魯迅先生学写小說	57

魯迅先生在青年时候怎样加强文学修养	61
魯迅先生譯《苦悶的象征》	68
《魯迅書簡》讀后感	71
进一步研究魯迅先生底遺作	73
魯迅先生著《故事新編》	76
魯迅先生是忠誠于无产阶级的	79

——紀念魯迅先生誕生七十六周年

魯迅先生是这样帮助青年的	81
魯迅先生是这样重視思想改造的	84
魯迅先生帮助青年学費	87
魯迅先生和孙中山先生	89
魯迅先生和古典文学	91
魯迅先生和假魯迅	95
魯迅先生的措詞	97
魯迅先生对于生命和工作的看法	100
阿Q——阿桂、阿貴和阿鼠	103
“歌唱碧湖春”和“万斤灯”	105
五堡十日小記	107
菠菜大蒜蒲車拉	110
江边見聞	112
人民的西湖	115
陶元庆的書面画	118
陶元庆的关于西子湖的詩画	120
峨眉山上的海市蜃楼	123
峙山閣	127

開鋼工人的風格 · · · · ·	129
訪溫州江心寺 · · · · ·	131

送妹子上北京

“如果家里还可以，我是，阿松也想給他进大学的。”

我在楼上，听到父亲在楼下書房里这样說，知道妹子在向
他要求上北京去讀書的事了。阿松是我的奶名。我在离开小
学以后，进了师范学校。并不是我志愿做个教师，只因为升入
普通中学，要繳学费、膳费，靠父亲在小学里教書八元、十元一
月的收入，无法应付。当时进师范学校，学费、膳费全免。父
亲給我四角小洋作零用，我要維持到三个月以上。师范学校
毕业以后无法进大学，这时我在小学里教書，收入也不多。我
注意靜听。

“我知道家里經濟困难。”妹子接着說，“可是我并不要家
里給我錢；我也不用哥哥的錢，讓他来补助家用。”

父亲沒有做声，妹子也不再說什么。我从楼窗望去，只見
那玻璃窗內，煤油灯的光亮映着两个影子，許多时候都沒有动
一动。我了解父亲的心境。他是爱惜子女的。我幼时掉入河
中，已經沉到水底里，他鉆到水底里把我救上岸。二姊死时，
他拍着桌子大哭。妹子也象我一样完全免費讀到师范学校毕
业，父亲知道她在小学里教書一年的收入，已經大半花掉了，
且不說到北京进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后也要用些錢，只是旅
费，就不大够。他自己中了秀才到杭州去乡試时，祖父还在，

还有做酒赚得的钱可用，只在百里路内渡个钱塘江，也要二伯父陪着花掉不少钱。让不过二十岁的妹子这样单独一个人去北京，叫他怎能放心呢！可是他不好硬阻止她去升学，因为受了五四运动的激荡；“打倒孔家店”，算作维新的人不便固执于父权。实在也是阻止不了的。家中曾经暗暗地为我和妹子各同人家订了婚，我们知道以后竭力反对，只好就给我们都解除了婚约。在“五四”的潮流中，我们青年，对于封建势力的反抗是勇敢、坚决的。凡是新出的书、新发表的文章，我们总要竭力设法弄得来看，买不到、买不起的，借得来看，远远地辗转借得来看，把《新青年》和《新潮》当作宝贝。我们也注意身体的锻炼，认真操练哑铃、棍棒等以外，我还打拳。我和妹子都在小腿上缚沙包，一点点地加重，练习飞快地走路。利用寒暑假，我们制动植物标本，绘乡土地图，月夜步测，全东浦村七十二条弄和七十二个湾都测量到。村中除我们兄妹以外，还有一个师范生，三个人星期六一道从城里回家，星期日一道进城去。初次穿着黑色短制服时，村中起来两种謠傳：“一个女人带着两名警察从城里下乡来了！”“两名警察押着一个女人进城去了！”被警察押着和算作警察，都是当时一般人所不愿意的。我们可不管这个。妹子为着节省时间多用点功，把头发剪短了。不料这引起了有些人的歧视。不能在杭州考取女子高等师范，她只好赶到北京去。

“不给儿子进大学，倒让女儿到北京去读书！”

妹子要出远门的消息透露出去以后，这样的舆论从左邻右舍起来。这对于父亲是个无形的责备，因为他是宗长。他暗自苦闷，仍然沉默，对于妹子的事不闻不问。父亲这样，别人

也就不多言。只我一个人帮助她温习功课，筹备简单的行李。

天还没有亮，我送她上船。在参加运动会以外，她以前只由我陪着到过杭州。怎样由杭州上火車，怎样在下关下車，怎样渡长江，怎样在天津换乘火車，无非靠我开給她的一張路单。我也还只有去过北京一次的經驗，而且是个可怕的經驗。我十八岁时，和另一个十八岁的人都是第一次一道到北京去，在下关的旅館里打听好去浦口的办法，一早去找“飞虹”碼頭渡江，在江边兜了几个圈子；实在已經几次到了目的地，只是不懂普通話，听来“飞虹”的声音和見到的“飞虹”两个字联系不起来，所以找到了还是以为沒有找到。等到弄明白，輪船已經开动，我那同道首先一脚跳过去。我要跳，已經来不及，只好尽力一縱扑过去，两手攀住船沿，脚已碰着了江水。

載着妹子的船搖远了，我还是站在船埠头。我感觉到責任重，推想到她会这样坚决冒險去北京的原因——她从小就受了不少强烈的刺激：剛伯母早年守寡，抑郁多年，忽在一个晚上，鮮血从鼻孔和嘴巴直噴；披散头发，白着两眼，滿臉是血，样子真难看。我家赶去营救，妹子是参加的。胖胖的二姊，受媒人欺騙，嫁了个肺病多年的丈夫，不过一年工夫就焦急而死。二伯母、小姨母和許多堂姊妹，或者被丈夫遗弃，或者遭受公婆的虐待，一个个地都落在悲境中。好比本来是在陷阱旁边掙扎的，望見了光明大道，自然要尽力奔赴。

旭日漸漸地从水面冒上，本已显得模糊的載着妹子的船給映照得鮮艳起来。我想她也将这样受到“五四”光輝的照耀，这才轻松地回家。

五四运动中的浙江潮

五四运动在北京轰轰烈烈地起来以后，我們浙江省迅速响应的，首先是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接着是宁波第四师范和绍兴第五师范。这运动主要由北京的学生从惩办卖国贼，打章宗祥，烧毁丁曹汝霖的住宅开始，为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压迫，实行抵制日本货，組織檢查队，檢查奸商的贩卖日本货和囤积日本货，一經查获，当即当众焚毁。

五四运动是在李大钊同志等的领导下进行的，注重組織工作。杭州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以后，就联合工人、店員和工商业者举行政治性的罢課、罢市和罢工。这是受了偉大十月革命影响的結果，虽然爆发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可是思想上早就有酝酿。北京大学出版《新青年》杂志，提倡文化革命，彻底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李大钊同志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維主义的胜利》和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药》，都是“五四”以前就在这杂志上发表了。一九一八年五月，北京也曾經有大专学生两千多个，为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的青島，反对北洋軍閥段祺瑞与日本訂立卖国的“中日共同防敌軍事协定”，举行了大規模的請愿示威运动。杭州第一师范也是“五四”以前就已成立“新生学社”，提倡白話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还有“書报贩卖部”的組織，时常到湖滨去

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当时我在母校五师附小教书，阅读的新书刊，一部分就是从这里来的；因为受了新思想的激荡和鼓舞，我这才挣扎到北京去工读。当时我们讨厌了桐城派的古文，得到这种新书，如获至宝。新书辗转地借来看，有了好的新书总要寄给朋友看，友谊往往建筑在新书的借阅和对新问题的讨论上。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杭州第一师范出版《浙江新潮》。浙江的潮头，犹如万马奔腾，古人譬喻作伍子胥盛怒的发作，是猛烈的。浙江的思想潮流冲激在文化革命中，也是猛烈的。远在一九〇三年，富有革命性的浙江留日学生，就在章太炎先生“吾愿越人无忘张煌言（民族英雄张苍水）”等话的激励下，在东京创办过《浙江潮》的杂志。鲁迅先生在那上面发表的《斯巴达之魂》，是借斯巴达的故事来激励我民族的斗争精神的。因为有过这个杂志的名称，所以这次来作革命潮涌涌象征的，在“浙江”和“潮”的中间，加上了个“新”字。通过《浙江新潮》和演讲、演戏等宣传活动，我们浙江省由五四运动掀起的革命高潮，主要有“打倒孔家店”和提倡工读的两个方面。五四运动要拥护民主和科学，所谓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民主，这和孔子的重孝道势不两立。第一师范以“非孝”来打孔家店，反对不平等的孝道，主张平等的爱。这是一种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因为封建道德的所谓孝，是巩固封建家族制度的主要支柱，封建的家族制度又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基础。“孝”这一教条，造成家长对于子女的独裁统治，并且最终驱使人民做封建统治者的忠实奴才。我们提出非孝，这可引起了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军阀为维持封建统治，横加压力，把第一师范的校长赶

走了。可是非孝的影响已經深入到青年中，象我和我的一个妹子，本来不敢違抗父母之命，就此把家中給我們代訂的婚約解除了。我們并没有去了解对方的情况，以为可能以后仍然結婚，可是要由自己恋爱，决不屈服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工讀，可以多方面地获得学习的机会；这在当时，也是避免封建家庭压力的一种手段。不依靠家中的錢做学費，就可以不接受家长的无理的命令。

我們浙江省的革命潮流，一向和錢塘江的自然潮流同样漲得有声有色，無論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是汹涌澎湃，浩浩蕩蕩的。虽然“五四”时期的青年如今大都变为白头，可是他們不怕困难、勇于寻求真理的精神，仍然可供参考。“后生可畏”，后生可愛，想見今日的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設的高潮中，定有更多更大革命精神的表現！

一九五九年

“五四”时期的学生生活

这次周揚同志到杭州来，在座談会上說到現在我們要造成一种学术空气。因此我联想到“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生活和学术空气。如今我去北京开会，有空到中山公园里去走走，回想起还叫做中央公园时的那些情况，使我恋念的，不是长美軒和来今雨軒的包子蛋糕，而是青年男女各自拿着洋装書在那里閱讀等新气象。当时的大学生，一般都穿藍布大褂，可是腋下挟着的洋装書，是五顏六色的。他們在柏树丛中，在假山上面，有的独自靜讀，有的并肩共坐，边談边讀。他們有的是同学，有的是亲友，也有情侶。他們外文程度不够的互相帮助，理解不透的相互启发。恋爱不忘讀書，也有的是由共讀而恋爱的，于說理中談情，在談情中說理，往来途中，坐在車子上，他們也总是捧着書本在閱讀的。

在公园里，如果你喝一杯茶，或者吸一瓶汽水，坐在藤椅上，会有卖报的人把当天要看的報紙送来，放在你的面前，《北京晨报》、《天津益世报》、《上海民国日报》等叠起一大堆。翻閱以后只須出一个銅子压在報紙上，不用等到卖报的人来收取，你可以随时走掉。这样，不用多花錢，可以看到許多份报。報紙的利用率高，也是節約紙張的一法。

《新青年》、《新潮》、北京《晨报副鰲》和后来上海出版的

《学灯》、《觉悟》、《青光》，都为好学的青年所注意。报刊、书籍，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还是邮寄来，邮寄去。有了新出的好书，如果不寄给朋友看，好象是对不起朋友似的。友谊往往建筑在书籍的借阅、赠送和学术的讨论上。

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先生和教授李大钊同志等的主持下，一方面提倡工读，一方面学术公开，招收“旁听生”。其实只要有熟人带领，没有办理登记旁听手续的，也可以进去听课。家贫升学不得、当小学教员又失了业的我就是这样进了沙滩大楼（现在叫做红楼了）的教室的。为着变文科和理科同学的相互轻视为互相尊重，理科添开文学概论课，文科添开科学方法论课，我在第一院文科听讲，也就学得了一些科学方法的知識。工读的同学，有的当校对，有的抄写书，有的洗衣服；许多同学在李大钊同志的帮助下在图书馆里做登记、编目等工作，我是在一个杂志社做校对、发行等工作的。只要有书可以读，我们不怕辛苦，什么工作，都不计较。

旁听的人最多的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无论已经毕了业的，别科、别个学校的同学，一星期一次，到时都三、五成群地赶来，在校内最大的教室听课，往往三个人合坐两个座位的凳子，甚至于四个人挤在一起。

俄文系的同学用俄语演出俄国的戏曲，记得校庆的一天，演出了列夫·托尔斯泰的《黑暗的势力》，是在靠河沿的第三院演出的。

凡有学问的名人来到北京，无论是从西洋来的，还是从东洋来的，总要请他演讲。有时地点在东四一带，我住在宣外南半截胡同时也要赶去听，往往晚饭后赶过去走十来里路，回来

夜已深，再走十来里。可是并不感到寂寞，西单石驸马大街女子高等师范里的总也有一部分人去，还有住得比我更远的。大家求知心切，一道步行，边走边讨论，只要有所得，总是快慰的。

我们也并非一味埋头读书，五四运动由打卖国贼开始，就是一个伟大的政治运动。这里的题目是“学生生活”，所以我只说有关学习的一面。

一九五九年

忆 沙 滩

“三子两，两子三！”

如今我每次经过以前北京大学的第一院，总要回想起这种叫卖柿子的声音来。无论当初我住在会馆里，和后来在鑾輿卫夹道做工，从北池子走过来，到了柿子摊旁，总已有点饿，有点渴。花三、两个铜子，买柿子，大的两个或者小的三个，饥渴都解决，得以甜一甜。这不仅嘴巴里的味道，尤其是精神上得到安慰，吃了柿子就可以溜进教室去听讲。说是溜，因为我交不出学费，固然不是正式的学生，也没有旁听生的名义。为着生活，我不能计划一年半载地连续学习，只好有机会就溜进教室去，听了一课算一课。欣逢五四运动，学术公开，提倡工读。失业的小学教师，跟着潮流漂荡，我居然在大学校园里选听起名教授的课来了。

路牌上面写着“汉花园”，可是大家都叫做沙滩。“沙滩大楼”这第一院的房屋现在叫做红楼了，的确，这在现在的北京，再也不能给人以“大”的感觉，——高楼大厦太多了。可是当时，除宫殿外，这是北京最高大的房屋中的一所。第一院是文科，由李大钊同志主持的图书馆设在这里。

大礼堂在景山东街的第二院，临时搭的大场所在靠河沿的第三院。我也常到那两处地方去听名人的演讲，常到第二